

一套日記庫、一本「趣味帳」領風騷： 日治時期日常生活史研究回顧與展望*

A Collection of Diaries and Compendium of Delights Par Excellence: The Past and Future of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 during the Period of Japanese Rule

陳文松 (Chen Wen-sung) **

近年來，有關日治時期日常生活史研究的成果，隨著數位資料庫的普遍應用、日記史料的接連問世出版與數位化，在臺灣學界與出版界，帶動了新的一波既可稱為新文化史，又可稱「新」新文化史的日常生活史研究風潮。為何又可稱之為「新」新文化史研究呢？因為，日常生活史的理論基礎，與其說是從新社會史到新文化史，毋寧說是從新社會史、新文化史合流而產生了日常生活史，只是發展較新文化史為晚，卻又有異於新文化史的研究取徑。新文化史逐漸與全球史接軌，尤其是對於人類物質文化與行為的全球化脈絡上，研究跨界與追求體系性、普遍性價值；¹ 反觀，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卻更貼近於在地化，以及著重於發掘人際活動所衍生出的個人日常生活內在與外在理路的零碎化牽絆，與闡述隱藏於其主觀思考與特定時空中的歷史脈絡。

若從過去幾個年度中對於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的討論「範疇 (category)」界定中，「日常生活史研究」

並不存在，而是被分別歸類在「社會文化史」和「生活史」的範疇當中。² 換言之，「日常生活」堪稱是近年來一個新興的研究範疇。但這並非表示，在以往的研究中，沒有這類所謂的「日常生活」研究的成果；相反的，「日常生活」的出現，由於在過去並不被有意識地認知為「日常生活研究」，而近年來，則是有意識地「被」耕耘，從原來屬於「社會文化史」或「生活史」的脈絡下，將其「日常性」凸顯出來。不過，由於仍處於初步萌發的階段，不管是理論的建構或方法論的描繪，以至研究成果的展現，並不算多。甚至，研究者本身，亦往往在並非有意識的情況下，踏入了日常生活史的研究而不自知。凡此，說明了日常生活史研究的範疇，在臺灣史研究當中，仍處於「發展中」的存在。接著，筆者以下將分成幾個層面來加以分析，逐步掀起日常生活史的面紗，呈現其發展的輪廓。

* 本文係105年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主辦「2014-2015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之論文。

** 作者為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1 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原著，馮奕達譯，《全球史的再思考》（臺北：八旗文化出版社，2016）。

2 此所列的研究成果，以往多被分類於體育運動休閒的範疇。參見許雪姬，〈2007年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臺灣史研究》16: 2 (2009.6): 179-181、陳翠蓮，〈2008年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臺灣史研究》17: 2 (2010.6): 189、范燕秋，〈2009年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臺灣史研究》18: 2 (2011.6): 214-215、張素玢，〈2012-2013年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臺灣史研究》22: 2 (2015.6): 216-220。

一、日記史料出版與日常生活史研究

本文雖是以 2014-2015 年度為主要討論的對象，但是如上所述，日常生活史研究的源頭，實在與臺灣近一、二十年來，對於日治時期日記史料的發掘、解讀與出版，甚至數位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更關鍵的是，隨著日記的大量出土，傳主「日常性」的生活營為與細節，與官方檔案形成強烈的對比與互補。於此，作為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史料學的主要工具——日記史料價值與日常生活史研究的特性，有必要以較長時期的光譜來加以論述。

二次戰後迄今，對於日記史料發掘與出版貢獻最為卓著的，首推張良澤教授與《吳新榮日記全集》（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07），以及許雪姬教授（及其長期投入的「某某日記解讀班」的所有成員）與《灌園先生日記》、《水竹居主人日記》和《黃旺成先生日記》的出版與出土，最具代表性。且後者更進一步包容前者，而有如今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³的最完整、不斷更新註解的龐大數位日記史料資料庫。藉此，日記史料接連問世所帶動的研究風潮，近年來便產出了眾多研究成果，其中尤其不乏日常生活史的研究成果。例如在 2006 年年底舉辦研討會而後集結出版的《日記與臺灣史研究：林獻堂先生逝世 50 週年紀念論文集》一書，可說是「介紹新日記、討論日誌史料的運用」⁴的集大成，象徵日記史料在臺灣史研究發展途上的一道新里程碑。而後，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也自此每兩年移地舉行一場大型的日記研討會，積極提倡與挖掘日記這種兼具歷史性與私密性的特殊史料之學術價值。⁵

以下，為了聚焦於本文主題，因此將介紹上述已出版中最具份量的四套日記，重新檢視主編在出版當下所

撰寫的「導讀」內容，是如何簡要地敘述日記在日常生活史中的地位和角色，以至如何醞釀孕育而形成今日的局面。

首先，許雪姬與其所引領的日記解讀班，在近十多年來所解讀出版的最具代表性的《灌園先生日記》，已全部出版完成。而早在全集出版伊始，許雪姬對於林獻堂日記所撰的整體分析中，便有如下的記述（按：底線為筆者所加，以下同）：

林獻堂以十分工整的筆跡要言不煩地紀錄每天發生在他身上的事，大至國家大事，小至日常生活的細節，都可在日記中看到。每天的天氣、所讀的書、起床上床的時間，病狀、醫療情形，甚至服何種藥都一一記錄，所以這部日記是林獻堂一生中最重要的見證。⁶

以及，

林家的日常生活，由日記中可知男性成員的娛樂為到大肚球場打高爾夫球（曾在菜園設一個小球場以供練習，並舉辦比賽），或騎馬、吟詩、聽戲、看電影。女性成員以林夫人為代表，她是標準戲迷，看戲為其最重要的娛樂生活，日記中林獻堂將家人所看的每一齣戲的名稱都記錄下來。⁷

「每天發生」的紀錄到「日常生活的細節」云云，可以讓讀者了解到日記與日常生活史研究的關聯性，而從這一套日記出版的當時，藉由這些傳主生活細節的史料性質中，不僅讓我們看到日治時期最重要的臺籍文化、政治與社會運動的代表性人物林獻堂，其實除了原有官方與公共媒體報導中為公眾所認知的面向之外，透過日記史料更讓後人看到其不為人所知的「日常生活」的另一面向，包括休閒與娛樂。而其中所提到的各式各

3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網址：<http://taco.ith.sinica.edu.tw/tdk/>首頁。

4 許雪姬等編著，《日記與臺灣史研究：林獻堂先生逝世50週年紀念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8），頁iv。

5 「寫日記者不一定有死後出版的打算，也正因為如此日記才有其價值。不過也因日記記載原只供個人參閱，記載較為直接無隱，衍生的問題頗多，增加出版的困難。」許雪姬，〈《灌園先生日記》的史料價值〉，許雪姬等共同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一）1927》（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4再版），頁(15)。

6 許雪姬，〈《灌園先生日記》的史料價值〉，《灌園先生日記（一）1927》，頁(5)。

7 同上，頁(6)。

樣生活細項，日後幾乎皆已陸續成了研究者探討的課題。

其次，由傳主張麗俊所留下的《水竹居主人日記》，幾乎是與林獻堂日記出版並駕齊驅的兩大套臺灣中部地區仕紳大族的罕見長時段日記。有關該套日記主人公的生平和經歷，甚至其重要性等，已為眾所週知，本文在此不再贅述。而此套日記的「日常性」的史料價值，與洪秋芬共同催生這套日記的許雪姬，於2000年出版時在導讀中，對該日記史料與日常生活史的關聯性，則有如下的闡述：

4. 生活史：有關年中行事，及娛樂等休閒生活，向來缺乏資料。作者這方面的記敘亦十分珍貴，（中略）至於娛樂方面，日記中記載不少往花街柳巷之事，其翔實的記載也許在衛道之士眼中是不道德的，唯個人認為這些記載有助於讓我們了解當時男性社會的生活狀況，實為難得的資料。至於較為輕鬆的休閒生活，自然包括看戲、參觀共進會、博覽會，到各處去觀光，比較有趣的是在廟前的活動（中略）。都是相當珍貴的資料。⁸

從「向來缺乏資料」到「實為難得的資料」，日記史料的私密性，在此段有關生活史的闡述中，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當然這套日記除了「生活史」之外，對於研究「家族史」、「宗教活動」、「地方產業」、「公共衛生史」、「民變史」、「對日本統治的看法」，以及「在文學史、政治運動史、保甲制度史上」都提供另一種不同於其他日記史料的特殊價值。⁹就是這樣面面俱到卻又能讓人各取所需的多重性日記史料，乃是最引人入勝的特色所在；然而這裡也指出日記中無所保留的將當事人攤在陽光下，如何被後人取捨和檢驗的「道德險境」。不過，如後張良澤所示，基於日記史料的誠信與價值，

完整的呈現實是日記史料的核心所在。

就在日記史料的研究逐漸形成風潮之際，也帶動民間對其先代所遺留日記的重視與日記史料「學術保存化」的趨勢，這對於日常生活史研究的持續邁進，無疑是一項助力。尤其在學術機構與民間的合力下，日治時期以降臺灣前人的日記，接二連三的出土，如此又帶動新一波的日常生活史研究風潮。繼中部上述兩套日記出版後，新竹黃旺成先生的日記也於2008正式出版問世。對此，許雪姬指出：

黃旺成先生是個有血有肉，真性情的人，以他眼光所看、筆下所記的世界，讓我們在細讀之餘貼近那個時代、了解那個時代，這對研究臺灣史的人，提供了活生生的背景、經驗，爾後研究相關題目，更能一針見血，闡述史料，為當時人代言。¹⁰

經過十年的解讀與研究，從此段引文便可體會到，日記史料與臺灣史研究，尤其是從日治時期到二次戰後的臺灣社會變遷，如何從日記傳主筆下的「活生生的背景、經驗」，找到種種的蛛絲馬跡，來「貼近那個時代、了解那個時代」，成為研究者在歷史研究上追求的目標與方法論。日記史料對日常生活史研究的貢獻與價值，至此不容置疑，且因著傳主的不同，所呈現出的日常生活細節亦因人而異、因地制宜。因此，《黃旺成先生日記》在日常生活史的研究上，依舊有其不可取代的特質：

（四）豐富的生活史資料：日記中舉凡宗教、民俗活動、宗族史、娛樂史、讀書紀錄、詩友會、下棋，這些生活的細節無不一一描寫，其中還留下了他日常吃的料理如炊粉等食品，穿的披風、變形鞋、編上鞋等。更有趣的是與同事、朋友會食攤錢時常用「抽虎鬚」的辦法來決定出錢數；而且購買的食物、領的薪水、買的物品，其價格

8 許雪姬，〈張麗俊先生《水竹居主人日記》的史料價值〉，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編纂、解說，《水竹居主人日記（一）1906-1907》（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臺中縣文化局，2000），頁17-18。

9 同上，頁13-27。

10 許雪姬，「編者序」，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一）1912》（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嘉義：中正大學，2008），頁ix-x。

都一一記上；日記後還有開支、收支的記帳，以供核對，對了解當時物價幫助不小。¹¹

換言之，即使統稱為「生活的細節」，亦因不同傳主而詳略不一。

從以上這股在臺灣政治解嚴後由許雪姬所主導推動的日治史料發掘、解讀與出版風潮，迄今未歇，且不僅臺人，還有身為統治階級的日本官僚，上至總督下至警察所留下的日記，亦相繼出版。藉此不同型態的日記史料交叉辯證，殖民地特殊的生活場域，更能烘托而出。

如同上述引文所提示，從日記史料所衍生出對於日治時期臺灣人在殖民體制下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育樂」等各層面，都引發研究者企圖透過日記史料來更貼近那個時代、了解那時代，以及隨著政權變動，那些各別傳主又是如何適應時代動盪及其內心曲折煎熬的真實樣貌。不僅日常生活史研究，包括整體日治臺灣殖民統治史或臺灣近現代史的理解與議題的深化，也深受日記史料的裨益匪淺。

而相對於這批政治解嚴後新出土的日記史料，其實在戒嚴時期，大家所熟知的吳新榮日記便已問世，但卻得經過「作者及譯者兩代之間的接力」以及官方、民間的協助，終於不必再以政治隱晦且偏重文學成就的「摘譯版」行走江湖，而得以在解嚴後，在家屬吳南圖醫師見證下授權給為此奔走超過四分之一世紀的編者張良澤教授，「全部刊出，不加修飾，不允刪減」，而以完整面貌重新問世。只「因為日記的最高價值在於『真』，如果我在『局部』動了手腳，恐怕影響『全部』的可信度。」¹²誠哉斯言！

為了催生出版《吳新榮先生日記全集》而費盡年月的張良澤，對於這套日記的評價可說讚譽備至，並以書信的方式，與吳新榮進行了一場感人的隔世告白：

第三：您作為一位鄉下醫生，每天忙著看病人以維持大家族的生計之外，又要忙著交際應酬、打麻將，有時也會偷偷去風流；您又愛看書，愛寫作，愛吃鱈魚麵，愛看電影，愛種花木，愛養家禽；後來又將大半精力投注於地方文史之採訪。看您每天都忙得團團轉，可是您總不忘把一天的所作所為、所見所思記錄下來。（中略）

第四：日記當然是記錄每天生活的瑣事，可是這些瑣事連貫了三十幾年之後，就成為珍貴的「史料」。而且這部「史料」記錄了從日治時代的繁榮期進入戰爭期，轉入戰後的動亂期，到國民黨專制的苦悶期為止。這段期間是臺灣史上變動最劇烈的時代，您不幸而生於此時代，但也有幸留下這些時代的證言。¹³

張良澤不僅完全肯定日記的「生活瑣事」的紀錄，更點出這種逐日、長時期書寫的日記，更是一項珍貴的日常生活紀錄與為時代所留下的證言。而這些「生活的瑣事」，正是研究日常生活史的寶藏。

二、作為一本「趣味帳」的入門： 《臺灣人士鑑》

如果說 1916 年所出版的《臺灣列紳傳》，是 1980 年代研究臺灣「社會領導階層」與「本土土地資產階級」最重要的人物傳史料，使後人得藉以分析清末到日初臺灣社會階層內在理路的發展與地方家族史、殖民統治史的百寶箱；¹⁴那麼 1930 年代後，由臺灣民報社所出版一系列不同時期的《臺灣人士鑑》，則堪稱是 1990 年代後期迄今，隱含著剖析臺灣社會更廣大的不同階層休閒娛樂的「趣味帳」。而首先慧眼識英雄、巧妙而精確地加

11 同註10，頁xi。

12 張炎憲，〈跨越時代的見證〉、吳南圖，〈序〉、張良澤，〈致吳新榮先生（代序）〉，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先生日記全集（1）1933-1937》（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07），頁8、10、16。

13 張良澤，〈致吳新榮先生（代序）〉，《吳新榮先生日記全集（1）1933-1937》，頁14。

14 若林正丈的《臺灣抗日運動史研究》中的「本土土地資產階級」與吳文星的《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中的「社會領導階層」的概念內涵，幾乎都奠基於對書中諸列紳的歸納與分析。

以運用的，要推前有呂紹理，後有黃慧貞、林丁國等。

呂紹理 1998 年以《水螺響起》，從「時間」觀念在臺灣社會的確立，到因著交通工具的近代化、機械化，讓廣大的臺灣社會有所依循，對於日常生活中的休閒活動有所規劃。這看似無足輕重的「時間脈流」，卻重重地打在以往偏重臺灣政治、經濟、社會運動史的臺灣近代史研究主流，而牽動出此後源源不絕的文化史與日常生活史研究的研究。堪稱「水螺」不鳴則已，一鳴就驚人。本書最獨特之處，除了點出當代最習以為常的「標準時間」的確立其實並非那麼自然而成，在史料運用上更巧妙的是，藉由一本早已出版、乾澀無味的人名錄，卻能如畫龍點睛似地從「趣味」項目中演繹出濃濃的日常休閒生活的韻味。

無可諱言地，《臺灣人士鑑》是由臺灣文化協會這群臺灣近現代知識菁英，依據編者設定的條件，從當時臺灣各地所「擇優」挑選而出，帶著一股黃慧貞所稱的「上流」階層的階級味；但相較於上述日記史料的「個人私密」性質，《臺灣人士鑑》所涵蓋的範圍不僅更廣，且所記載的資料都是「個人公開（公眾）」性質的內容，反而可與日記史料相互為用，更貼近那個時代的社會脈動。尤其，每位人士在文末如狗尾續貂般存在的「趣味」項目，竟是意外掀起臺灣社會文化與運動休閒風的寶貴線索。對於《臺灣人士鑑》，呂紹理認為：

《臺灣人士鑑》中每一個人的基本資料大體都相當完整，以這些基本背景資料，正可以和其娛樂活動資料配合，用來說明在不同年齡層、教育程度、職業背景、居住地點及家庭狀況等因素下，人們的娛樂活動表現出何種特質。¹⁵

這段話，充分道出作為一本「趣味帳」的《臺灣人士鑑》，在研究臺灣人士，甚至當時在臺日人（雖然當時呂紹理加以割愛）所從事的娛樂活動的種類，是可以

加以進行整理與分類的，藉以探討臺日人的「休閒活動特質」以及「生活作息」。後來，黃慧貞同樣著眼於《臺灣人士鑑》的這筆「趣味帳」，並將研究的版圖從呂紹理僅限於臺中州一地，而擴展到「臺灣西半部」（花東及外島除外），同時也將「在臺日人」的興趣列入進行對比，以東、西洋對照的方式來呈現出更深入而詳細的探討。¹⁶不過，筆者認為基本上，黃書並未超出呂紹理的研究理路，只是擴而大之。

有趣的是，兩者都曾依據這本「趣味帳」將當時臺灣人的休閒活動，進行了分類。呂書分成了「靜態娛樂」、「運動」、「音樂」及「其他」四大類，¹⁷而黃書則以「藝術活動」、「體育活動」、「文學活動」、「農藝活動」，以及以不同文化別之下，又有漢人獨有的「漢文活動」和在臺日人獨有的「藝文活動」進行區分。¹⁸呂書的分類相對明瞭，黃書因將在臺日人列入而呈現更為複雜的樣貌。但不管如何，藉由這些分類，使得後人更意識到所謂的日常生活休閒的樣貌與項目的多元化，都有其獨立研究的可能性。

不過，不論呂書或黃書，無獨有偶，都擁有一道無法突破的罩門，而之所以無法突破，正好與上述日記史料的尚未廣泛運用，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呂紹理在討論《臺灣人士鑑》所呈現的休閒活動類型，雖有相當的斬獲，不過在小結中，呂紹理與黃慧貞都先後指出：

從《臺灣人士鑑》當中，我們雖然能描繪出當時社會領導階層在休閒活動上的「傾向」，但我們無法從其中判定，他們在什麼時間、花多少時間來享受他們的休閒生活；他們儘管可有許多「興趣」，但無法顯示他們生活當中休閒活動所佔的地位如何。¹⁹

對此，黃慧貞在其論述的結論中也認為：

總的來看，《臺灣人士鑑》提供研究日治時期臺

15 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生活作息》（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8），頁157。

16 黃慧貞，《日治時期臺灣「上流階層」興趣之探討——以《臺灣人士鑑》為分析樣本》（北縣：稻鄉出版社，2007），頁23-24。

17 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生活作息》，頁159-160。

18 黃慧貞，《日治時期臺灣「上流階層」興趣之探討——以《臺灣人士鑑》為分析樣本》，頁28-29。

19 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生活作息》，頁165。

灣上流階層興趣的最好依據。雖說其中並沒有詳實記載人士在這些興趣上所花費的時間及其喜好程度如何，但透過這些資料的整理與統計，仍可看出當時臺灣上流階層興趣選擇的趨勢。²⁰

眼尖的讀者看到這裡，可能心中也有了一些答案。沒錯，日記的出土及其史料特性，剛好可以填補這項空白與某種程度解決這道難題。筆者在一篇以日治時期麻雀這項室內社交娛樂工具為主題，並以吳新榮等人的日記史料為主的討論中，就曾試圖解開這道難題。

（按：本文）將焦點專注於日治時期個人的麻雀經驗與日常生活史的刻畫，並且以吳新榮日記為中心，期有助於理解打麻雀這項社交娛樂在個人層次的日常生活中究竟扮演何種角色，以及欲藉由打麻雀來達到何種目的。若沒有日記史料的出土，麻雀始終都是他人的「麻雀談」，無法釐清「打」麻雀與日常生活的經營究竟有著何種關聯，以及明瞭「打」麻雀的個人主體敘述。²¹

正因為吳新榮日記的毫無保留，且鉅細靡遺地記錄其生活的動態與生活作息的律動，因此在何時「打」、花費多少時間，以及在哪一種空間「打」，和誰「打」，情緒的變動與人際關係的往來等，反而可在日記中一覽無遺。

換言之，不論是新文化史或日常生活史，在呂紹理敲響「水螺」之後正式揭開日治臺灣史研究的新趨勢，許多過往已存在的史料被拿出來重新省視，結合新的理論、新的思潮而有了更貼近底層、更貼近日常生活層次的探討。《臺灣人士鑑》這套傳統典型政治、社會、經濟領域臺日人菁英的人物傳，可說與1916年出版的《臺灣列紳傳》的以傳統士紳為主的人物傳，前後相承；豈料，前者所增列的「趣味帳」，原本只是畫蛇添足、狗尾續貂式的餘興之筆，竟掀起後世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的「畫龍點睛」之作，恐怕遠遠超出當時編者的本意。不過，徒法不足以自行，若無後世接連出土、同時期的

日記史料問世，這些「趣味」依舊只是一種「傾向」的泛泛宣示，無法扣人心弦且難以進一步深究了。

三、從知識階級到大眾的日常生活：陳柔縉、蔣竹山的大眾日常生活史描繪

日常生活史（history of everyday life）要自立門戶、站穩腳步，從字面而言，就必須要從點、線、面，從日、月、年，從時間、空間、時代背景等，水平與垂直兼具交錯的不同面向，努力鋪排出「日常性」的生活營為。而很明顯的，在史料上，這種日常性的生活營為可透過日記史料，來進行某種程度的補填。但日記史料可遇不可求，更何況大部分日記往往殘缺不全，更甚者只留下幾年或數月，上述所提代表性的日記之所以有代表性，其實就是剛好滿足長時期的日常性生活「細節」記述。因此，從事日常生活史研究，不能也不可單憑據日記史料，而須與其他現存或主動性挖掘其他史料相互參照印證，始能較為完整呈現日常生活議題的不同面向。

其次，除了史料外，還是要回到進行這些「日常性」生活營為的主體上，也就是人本身。日記史料很明顯的，都是能文善墨的知識階層，而人數更多的所謂「大眾」或「公眾」，往往不容易留下紀錄。所以為了找尋這些不知名的大眾殘存的主體性，或欲將日常生活史研究奠基於更廣大的基礎上，去追問「大眾」如何「生活」的研究，不僅是日常生活史，同時也是大眾生活史（公共史學）共同研究的歷史課題。

就本文焦點而言，日治時期報刊雜誌，如《臺灣日日新報》的復刻出版與數位化資料庫建置，與日記史料相同，對於日常生活史研究都扮演著推波助瀾的關鍵性角色。同時，也突破特定人物傳中的菁英指數偏高的侷限，不但將對象拉到更廣泛的一般讀者層，即使我們仍會質疑這些「一般讀者」亦非目不識丁的販夫走卒，無法代表所有「大眾」；如果不那麼幾近苛求，這些「daily

20 黃慧貞，《日治時期臺灣「上流階層」興趣之探討——以《臺灣人士鑑》為分析樣本》，頁203。

21 陳文松，〈日記所見日治時期臺灣人的「打麻雀」——以吳新榮等人的經驗為中心〉，《成大歷史學報》45（2013.12）：136。

news」至少在那個缺乏「public media」的時代，已將那些「people（人士）」打入凡間，與一般人站在同一個伸展臺，任人說長論短。因此，作為後人的我們，可以用各種歷史性觀測的角度，去掀開一版接一版、一篇接一篇不同的「版面（version）」，去探究「era」的 daily life。陳柔縉的《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與蔣竹山《島嶼浮世繪：日治臺灣的大眾生活》，可說是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

從書中內容的篇名，諸如〈臺灣第一個母親節〉、〈懷念的鐵路便當〉、〈鐵達尼船難消息在臺灣〉、〈早稻田的咖啡店〉（以上陳書），以及〈島都——城市裡的二十四小時〉、〈修學旅行——課堂外的新體驗〉、〈公會堂——遍佈全臺的市民集會場所〉、〈江山樓——臺灣料理的首選〉和〈屈臣氏——原來天天都便宜早就有了〉（以上蔣書）等，儘管作者內容偏重不同、敘事策略亦不同，但基於「時代不專屬於誰」、「故事不計大小」，「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的使命感，²² 陳柔縉上圖書館翻遍了日治時期的報刊雜誌，重新拼湊日治時期臺灣人日常生活的大小事；而蔣竹山則是基於推廣大眾史學的使命，身體力行，從吳新榮日記史料著手，再從中篩選出足以凸顯日治日常生活的眾多關鍵詞，然後丟入更龐大的報刊數位資料庫去翻攪，「希望透過這樣的設計，能夠呈現出不同以往刻板印象裡的日治時期的大眾生活」。²³ 內容生動有趣，深入淺出，而且搭配搶眼的圖畫或照片。尤其兩人充分運用報紙和日記這類最具日常生活性的史料，並企圖顛覆主流學院派歷史書寫的既存框架，不僅要貼近時代、貼近底層，更希望以貼近現代讀者的日常生活的「目線（視角）」來重新詮釋什麼是歷史。這點由兩書在一上市，便紛紛長期登上暢銷書排行榜寶座可知，這種「類小品文」的日常生活史書寫，是深受讀者大眾喜愛的。

當然這類日常生活「史普」專書暢銷的背後，也反映出近年來上述日記史料、報刊數位資料庫的運用，對於日常生活與休閒活動在學術鑽研的累積與議題的開發是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這方面的學術成果包括：專書

有林玫君《從探險到休閒：日治時期臺灣登山活動之歷史圖像》（2006）、林芬郁、沈佳姍、蔡蕙頻《沒有電視的年代：阿公阿嬤的生活娛樂史》（2009）、謝仕淵《國球誕生前記：日治時期臺灣棒球史》（2012）、廖怡鈺《女給時代：1930年代臺灣的咖啡店文化》（2012）、曾士榮《近代心智與日常臺灣：法律人黃繼圖日記中的私與公（1912-1955）》（2013）等，論文則有郭立婷〈味覺新滋味：日治時期菓子業在臺灣的發展〉（2010）、陳玉箴〈日本化的西洋味：日治時期臺灣的西洋料理及臺人的消費實踐〉（2013）、曾品滄〈從花廳到酒樓：清末至日治初期臺灣公共空間的形成與擴展（1895-1911）〉（2011）、黃俊融〈日治時期鐵道餐旅文化之研究（1908-1945）——以「鐵道餐旅」與「鐵道旅館」為例〉（2013）、黃裕元〈日治時期臺灣唱片流行歌之研究：兼論 1930 年代流行文化與社會〉（2011）、鄭政誠〈從《灌園先生日記》看林獻堂的讀書生活〉（2009）、許書惠〈從《水竹居主人日記》看日治時期常民生活中的演藝活動〉（2009）、林丁國〈從日記資料析論日治時期臺日人士的體育活動〉（2013）、陳文松〈日記所見日治時期臺灣人的「打麻雀」——以吳新榮等人的經驗為中心〉（2013）、植野弘子〈臺南生活文化上所受之日本統治的影響：高等女學校之教育與其研究意義〉（2008）、李毓嵐〈林獻堂生活中的女性〉等。

至於近兩年內的相關研究成果，則有王靖雯〈論吳新榮的愛情觀與家庭觀：以《吳新榮日記全集》為主〉、林玉茹〈過新年：從傳統到現代臺灣節慶生活的交錯與嫁接（1890-1945）〉、吳玲青〈日治時期臺灣的日記本：以《臺灣日日新報》的記事為例〉、周俊宇〈もう一つの新嘗祭：植民地台における祭日としての展開〉、顏杏如〈從「常夏」到「四季」——日治時期在臺俳人中的季節感與生活寫實（1895-1936）〉（以上 2014 年）、李毓芳〈《臺灣日日新報》所見之明治時期（1895-1912）漢人音樂戲曲活動〉、張志樺〈當臺灣開始談戀愛：日治時期戀愛論述史〉、陳靜寬、黃裕元〈戰爭做為一種流行：從二戰時期（1937-1945）相關商品文物看臺灣

22 陳柔縉，《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09），頁17。

23 蔣竹山，《島嶼浮世繪——日治臺灣的大眾生活》（臺北：蔚藍文化出版社，2014），頁19-23。

本土社會的戰爭觀》、曾品滄〈日式料理在臺灣：鋤燒（スキヤキ）與臺灣智識階層的社群生活（1895-1960年代）〉、曾品滄〈戰時生活體制與民眾飲食生活的發展〉、戴華萱〈「寧願燒盡，不願鏽／朽壞」之精神內涵：從《馬偕日記》探析馬偕的日常生活及精神〉、戴鳳碧〈飲酒新時尚：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飲酒文化與消費〉（以上2015年）等。專書則有林淑慧《旅人心境：臺灣日治時期漢文旅遊書寫》（2014）、陳煒翰《日本皇族的臺灣行旅：蓬萊仙島菊花香》（2014）、許佩賢《殖民地臺灣近代教育的鏡像：一九三〇年代臺灣的教育與社會》（2015）等。

從以上羅列的專書或論文，可看出對於日治時期日常生活的休閒與娛樂，幾乎含括食衣住行育樂等各種不同型態，且涵蓋不同族群的不同階層，從個人娛樂、日常生活到流行文化的探討都有。當然掛一漏萬，相信仍有更多研究成果，乃基於關懷日常生活而出發的。

四、日常生活史，是瑣碎的日常生活研究？

儘管上述有關日常生活史研究的成果相當豐碩，也相當多元。不過，在不少人的印象裡，所謂的「日常生活」不可否認的，也常常令人難以捉摸，而認為不過就是零碎的日常生活拼湊；同時，對於日記史料的內容，也深感瑣碎——「瑣事」。換言之，難道日常生活史，就是一種瑣碎的日常生活研究嗎？對於這點，與吳新榮同為鹽分地帶夥伴的林芳年，確實也有著相同的看法。²⁴

而如本文一開始所引，許雪姬在不同日記所解讀的導言中，確實也未否認這點，並且先後提及「林獻堂以十分工整的筆跡要言不煩地紀錄每天發生在他身上的事，大至國家大事，小至日常生活的細節，都可在日記中看到」，以及黃旺成「日記中舉凡宗教、民俗活動、宗族史、娛樂史、讀書紀錄、詩友會、下棋，這些生活

的細節無不一一描寫」；然而，從許雪姬到上述所介紹積極利用日記史料進行相關研究的研究者而言，對於日記史料的「細節」反而不感瑣碎為惡，正如張良澤對於吳新榮日記的所謂「瑣事」的看法相同，即認為「日記當然是記錄每天生活的瑣事，可是這些瑣事連貫了三十幾年之後，就成為珍貴的『史料』」。

而植野弘子亦認為對於日治時期文化史或日常生活史的研究，這些各式各樣瑣碎的細節，不僅必要，甚至可補充口述歷史往往過度偏重「個人大事」敘事傾向的不足。植野弘子指出：

在日治時期被引進的新的生活方式，究竟對於臺灣社會，以及臺南地區具有著什麼樣的意義呢？分析此項課題之際，「口述歷史」資料是具有不小之意義的；然而這些記錄談的多半是人生的大事、重要階段或是門第的事，往往有著疏忽掉瑣碎、不經意的日常生活之傾向。因此今後增加、累積有關日常生活方面的訪談資料，同時持續從事可充分理解生活環境與考慮到臺南之特質的日治時期研究是必要的。²⁵

誠然植野弘子主要是針對日本文化在臺灣社會——尤其是對臺南地區影響的動機為出發點，但也對於以往口述歷史訪談的內容過於偏重個人的重大事蹟或重大事件，反而「疏忽掉瑣碎、不經意的日常生活」資料的偏頗，認為有加以補正的必要。

除此之外，如前所述，日常生活史研究在以往的臺灣史研究當中，並未被視為單一範疇而被正視；但這並不表示對於日常生活史研究的理論移植和探索，甚至藉由教學課程的實踐推廣是缺席的。

例如，成功大學外文系教授張淑麗於2009年，就曾在科技部（前身為國科會）所出版的《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前瞻學術議題深入報導」，以〈日常生活研究〉專文深究「日常生活研究」的問題化、方法論，與如何再現日常生活的「空／閒」，同時認為它「也是學界在

24 陳文松，〈日記所見日治時期臺灣人的「打麻雀」——以吳新榮等人的經驗為中心〉，頁139。

25 植野弘子，〈臺南文化上所受之日本統治的影響：研究高等女學校教育對臺灣生活文化之意義〉，收錄於林玉茹、艾茉莉主編，《南瀛歷史、社會與文化》（臺南：南瀛國際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08），頁427。

思考『現代』、『全球』與『在地』的糾結時另闢的路徑」。²⁶而中國學者劉新成更早在2006年發表一篇名為〈日常生活史：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專文，他一開始便指出：

日常生活史學於20世紀70年代中期興起於德國和意大利。在意大利，日常生活史被稱為「微觀史學」。80年代初，日常生活史不僅在學術界受到關注，而且走出高等學府和研究機構，進入社會視野。²⁷

他同時指出，「作為史學的一個分支，日常生活史是西方現代史學自我反省、自我批判的產物」，批判歷史結構主義、批判歷史虛無主義。他同時歸納出日常生活史研究發展迄今，已具備「研究對象微觀化」、「目光向下」、「研究內容包容萬象」、「重建全面史」和「他者立場」。至於所謂「他者立場」就是：「站在歷史當事人的位置上，「設身處地地感覺和體會」。他們認為，「研究歷史最重要的是理解，理解了古人也就理解了自己。」

而在1998年出版了日治臺灣社會生活作息研究的《水螺響起》後，呂紹理仍舊持續關注思考日常生活研究領域的鑽研，並透過不同方式來企圖推廣作為歷史研究方法論的「日常生活研究」。2013學年度下學期，呂紹理在新東家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開設「近代臺灣社會生活史」（History of everyday life in Modern Taiwan），課程概論如此寫著：

近十年來社會史研究的趨勢，逐漸從「社會結構」的探討轉變為「日常生活史」的建構，以重新勾勒庶民大眾的生活圖像，並以此為基礎進一步理解社會文化的特質。本課程即藉由社會生活及生

活知識的形構，探討近代臺灣社會變遷的過程，並進一步分析殖民地社會文化的各種變貌。授課過程中，希望藉著閱讀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及史料分析，刺激同學開發研究臺灣社會變遷的新方向。²⁸

除了課程之外，2014年10月呂紹理也在學術社群網站「歷史學柑仔店」上，發表一篇〈從「柑仔店」到歷史學：思考日常生活史與公眾（大眾）史的交錯〉，進一步闡述日常生活史的奧義與重要性：

專業史學何以會與大眾如此疏遠？如何拉近此一鴻溝？我以為，日常生活史的探索，正是消弭鴻溝的重要途徑。如果稍微觀察一下書肆的表現，我們將會發現，各種與生活史相關的通俗作品，不管是包裝在「懷舊商品」之下的商業空間，或者仍具有一定程度學術規範的《西方文明初體驗》《島嶼浮世繪》等書，都極受歡迎而銷售一空；相對之下，日常生活史要獲得學術界肯定，恐怕還有很長一段路要準備。由於有些人認為這類關注日常生活瑣事的歷史是「雞零狗碎」甚至「聲色犬馬」，不但目光如豆且失去了史學為時代諒言的宏旨。這種基植於「大敘事」的眼光，限制了吾人對於日常生活所形成的重要人生經驗和歷史意識的理解。在我看來，生活史既可滿足大眾的好奇與懷舊，它更有非常積極的政治社會經濟的意義。它既包納了芸芸眾生的欲求、經驗與記憶，牽動出個人與集體的關係，更幽微地映射了時代的容貌。²⁹

筆者在此較為大篇幅的引用，實乃欲藉此呼應本文全篇的論旨，同時也是對「日常生活史」研究今後能繼續深化來進行呼籲。筆者在深究吳新榮日記之後，亦深

26 張淑麗，〈日常生活研究〉，《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10：3（2009.6）：22-28。張淑麗主編，《英美文學評論18日常生活》（臺北：書林書店，2011）。

27 劉新成，〈日常生活史：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光明日報》，2006年02月14日，網址：<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49154/49156/4102153.html#>，檢索日期：2016/11/28。

28 國立臺灣大學課程網，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123%20M6730&class=&dpt_code=1230&ser_no=70106&semester=102-2&lang=CH，檢索日期：2016/11/28。

29 呂紹理，〈從「柑仔店」到歷史學：思考日常生活史與公眾（大眾）史的交錯〉，引自歷史學柑仔店(<http://kam-a-tiam.typepad.com/blog/2014/10/從柑仔店到歷史學.html>)，檢索日期：2016/11/28。

感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可行性和重要性之必要，並與呂紹理不謀而合地於 2015 學年度上學期在成功大學歷史學研究所開設了「日治臺灣日常生活研究專題」，³⁰ 希望藉由日記史料之共同研讀，以持續開展這片尚待眾人投入的學術園地。

五、結 論

從日記史料中所記錄的生活細節，到社會運作的生活作息的變遷，人們開始將眼光投注於日常生活中的「瑣事」，而且事不分大小也無關階層，日治時期的一本「趣味帳」，掀起臺灣近二十年來社會文化、娛樂休閒史研究的先聲；緊接著，隨著日記史料的大量出土和出版，逐日記載的長時段私人日記，更是提供日常生活史豐富的材料，此時搭配科技的助力，日治時期的報刊雜誌以及影音圖像等，一一再現百年前臺灣社會的諸種面貌，人人都可以從中攔截日常生活中的圖像，重現歷史風華。

「有可能撰寫私生活史嗎？」針對此質疑 M. Perrot 的回答是肯定的，前提是必須先扭轉我們的價值觀念，只要能看淡英雄豪傑獨佔的歷史，私領域就會擺脫邪惡、禁忌和黑暗色彩（中略）它會被承認為值得探訪的人類生活重心，是具有正當性的研究對象，「私生活史不只是稗官野史，更是日常生活的政治史」，而與國家、經濟、社會的大歷史進行對話。³¹

作為歷史研究的日常生活研究，確實某種程度翻轉

以往偏重「英雄豪傑」的史觀，企圖更貼近歷史「真實」的生活情境，去理解卸下層層武裝和防備後的歷史人物不輕易示人的另一面向，同時重建其日常生活的樣態來與時代的大歷史進行互動式的對應，大人物有其日常不為人知的一面，更何況有更多不知名的人物，都可透過此一新的研究取徑發掘出歷史發展更寬廣的面向。

不過展望前景，日常生活史研究上所面臨的挑戰並不少。首先，日常生活中的事物，並非不辨自明，加上，何謂「日常生活」的界定與看法，也往往人言言殊，仍舊缺乏鮮明而嚴謹的定義。其次，作為日常生活史研究重要材料的日記史料，誠然各種不同傳主的日記史料確是「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同時，透過日記記錄毫無遮掩地坦露在所有讀者面前。生活萬象，千絲萬縷，如何將其「議題化」、「學術化」且以小見大，並非易事。這也使得日常生活史的研究看似容易，實則難以駕馭。第三，日記史料無法單獨存在，除了輔以其他史料、檔案等將日常生活的細節和瑣事「脈絡化」之外，還須以俯瞰全局的視野，盡量趨近日常生活的樣貌，掌握與大時代的相互影響。第四，研究者本身不僅須具備專業的史學素養，更需抱持著隨時因應日常生活中各種「雜學」的好奇心與培育相關素養的能力，當然這並非一蹴可幾，但絕對要具有跨域、不斷學習的好奇心和決心。最後，日記史料在日常生活史活用的面向，目前大多集中在休閒娛樂生活和飲食文化的議題上，如何擴展至其他經濟生活、政治活動，甚至心態史的研究上，仍有相當大延展的空間，期待今後有更多生力軍投入日常生活史此一研究取徑的行列中。

30 國立成功大學課程查詢網頁，http://course-query.acad.ncku.edu.tw/crm/course_map/course.php?dept=K3&cono=K389500，檢索日期：2016/11/28。

31 張人傑，《臺灣社會生活史——休閒遊憩、日常生活與現代性》（臺北縣：稻鄉出版社，2006），頁45-46。